

都市视角下的鲁迅《野草》重释

张 娟*

〔摘 要〕《野草》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镇,前人从不同角度对这部散文诗集做出不同意义向度的阐发,但极少从都市角度认识。反观《野草》写作,和鲁迅的北京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可以看到鲁迅作为“都市漫游者”对城市灰暗面的思考,对市民社会世态人情的揭露和城市发展中物质至上的诙谐批判,另一部分偏重灵魂表达的作品则以现代性的思想、西方式的表现方式体现出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关键词〕 都市;鲁迅《野草》;重释

《野草》是鲁迅的散文诗集,从出版至今,都是鲁迅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新时期以来,众多鲁迅研究大家对《野草》做出了丰富而深刻的阐释。如张梦阳、王吉鹏等的《野草》研究史整理,李希凡、钱理群、解志熙、李玉明、阎庆生等人的心理学分析,孙玉石、吴中杰、汪晖的哲学思辨,殷国明、孟瑞君等的美学阐释,吴小美的《野草》中外文学比较,张闳、郑家建的诗学探讨等等。但迄今为止,几乎无人从都市角度认识这本散文诗集。《野草》写作的1924年到1927年,北京已经是较为现代的城市,当时鲁迅身在北京,不可避免地卷入都市进程中的种种人事纠纷。“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①。相对应的是1926至1927年间,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躲到故乡的回忆里去表达对都市的不满。作为对应,作于《朝花夕拾》前的《野草》实质是鲁迅借用散文诗这种手段描述自己在北京的城市生活感受。

北京这个城市对鲁迅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12年,鲁迅作为教育部成员随部北迁,一住14年,北京成为他在国内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他在这里发出自己的第一声“呐喊”,随后又陷入“彷徨”。《野草》写作已是他在北京居住的最后几年,在散文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北京城市生活的观感与体验。

一、都市漫游者的思考

在研究波特莱尔的诗作时,本雅明认为波特莱尔充当了巴黎这座城市的游荡者:他漫步在巴黎

* 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10096。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11&ZD114)阶段性成果。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6页。

的拱廊街上,他收集都市人群在城市迷宫中转瞬即逝的意象,继而,本雅明把游荡者的概念引入其他的城市文学研究中。在中国,最适合用都市漫游者概念研究的莫过于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学者李欧梵也在其《上海摩登》中用漫游者的概念来解析文学作品中的上海形象。用城市的眼光打量《野草》,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在《野草》中同样有一个都市漫游者的形象,只不过是,波特莱尔笔下是“巴黎的忧郁”,而鲁迅的笔下则是“北京的苦闷”。鲁迅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观察着都市,在街道漫步。正如本雅明所讲,文人、乞丐和妓女是街道上的三个经典形象。《野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类人群,最突出的就是文人和乞丐的形象。

正如新感觉派一样,“文人”往往就是行走着的作家本人。“城市的发展造就了新型的市民生活书写者,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同时这些漫游于城市,迷失在自己思绪中的书写者也以他们文字的力量传达着对城市的理解。”^①《野草》中的文人正是行走着的鲁迅,他观察着、思考着,在他的视角下,北京是个灰暗的城市。在京期间,鲁迅的情绪十分低沉,除了上班,终日抄古碑,读佛经,整理古籍,北京给予他的也是灰暗、寂寞、阴沉,在《野草》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都市印象。《风筝》开头“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就暗示了鲁迅对北京这个前现代的古城的悲观体认。在《求乞者》中,首先逼入眼帘的就是无处不在的“灰土”。“灰土”在这篇小短文中出现了八次,且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具有由弱渐强的节奏和韵律,成为烘托情绪、呼应内容的一个重要手段。鲁迅笔下的风沙超越了现实的与自然真实层面,成为现代社会的干燥寒冷与现代人的寂寞悲凉的象征。这样的“灰土”与“剥落的高墙”和街上“各自走路”的行人一起,立体地呈现了社会现实的寒冷与人际关系的冷漠。这种灰土中的沙城可以被看作是鲁迅笔下众多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困境的比喻之中的一个典型。当时的北京,虽然已经具有人口众多的移民,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中仍有很多老中国的影子,充满前现代的色彩。

乞丐是现代都市的寄生虫,是本雅明“都市漫游者”中的被讨论的重要人群,也是在鲁迅笔下经常出现的形象。鲁迅正是在行走与观察中发现这个城市的痼疾,如《狗的驳诘》中“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象乞食者”,发生视角置换,将自己置于求乞者的位置。“城市生活的一个极大特征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互相见面又互相混杂在一起,但却从未互相了解”^②。现代城市流动性大,密度高,人与人却不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客观上更难维持,“瞒和骗”更容易得逞,而这个正是鲁迅极度痛恨的。《求乞者》的故事发生在秋天,天气并不十分寒冷,我穿着夹衣,“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从求乞者的穿着“夹衣”和表情“不见得悲戚”,说明求乞者的身份是可疑的,他们并不需要我的任何施舍,因为我也穿着“夹衣”。“我”厌恶他们装腔作势,厌恶他们使用“求乞的法子”。人虽是难免有穷困无助之时,但一个有尊严的人哪怕做无奈的行乞之举时,也会有难堪和悲哀之色。孩子“不见的悲哀”,实质在提醒我们这是借用现代市民社会的陌生化和流动性在欺骗他人。其中一个孩子还用欺骗的手段,装哑作伪,更是虚伪至极。鲁迅表面写的是对作为“求乞者”的孩子的憎恶,内心深处却是在为现代社会诚信缺失而悲哀和愤怒。

经过细读文本,还会发现有个细节反复出现了四次,那就是“另外几个人各自走路”,这一细节和当时的自然环境“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相得益彰。无论是小孩子在追着哀呼求乞,还是我在沉思中将要求乞,几个行路人对此都毫无反应,依然在赶路,赶路,这正是现代都市行色匆匆的陌生人

①张娟:《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中的“都市漫游者”叙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②RE. 帕克、E. N 伯吉斯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的真实写照。这就揭示了社会的灰暗冷漠。在这个互不关心的社会里,人们没有真正的关心和同情。所以,从城市语境的角度出发,《求乞者》正是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这些城市流民,他们离开土地,不务生产,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是用欺骗性的乞讨与油滑来获得金钱,传统中国人的礼义廉耻、自我尊严在他们身上都消失殆尽。正像徘徊在城市边缘的阿Q们,他们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怪胎,所以“我”以“不布施”的极端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商业社会中“寄生虫”的不妥协。

二、市民社会的揭露

现代城市与市民阶层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从本质上说来就是市民社会。城市是工业发展和商业文明的产物,一方面它提供了我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创造了更为舒适的环境与更丰富的文明,但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很多文明的副产品,比如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等。鲁迅在绍兴居住16年,在东京居住5年,在北京居住14年,城市的居住体验使他对城市生活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与精神选择有更为深入的观察。《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和奴才,《这样的战士》里的“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狗的驳诘》里的主与奴,《立论》里的圆滑之人等等,构成了一个充满世俗味道和功利气息的市民社会。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揭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市民生存哲学。聪明人体现了一种市侩哲学,他善于用一副伪善的面孔取得旁人的信任,是一个圆滑世故的具有犬儒主义和市侩气息的人物;奴才代表的是一种奴才哲学或诉苦哲学,他从诉苦中求得片刻的慰藉,并将这种空洞的“同情和慰安”视为未灭绝的天理;傻子是市民社会中的清醒者、反抗者,也是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象征,他象征一种行动哲学、反抗哲学。在与奴才和聪明人的鲜明对比中,彰显出这种反抗哲学的宝贵,他的身上更能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但这种反抗在整个充满市侩气息的市民社会中,却显得无助,充满悲剧气息。

《这样的战士》同样把不屈的战士放在一个鱼龙混杂的市民社会背景之中,他们由“学者、文士、长者”构成,戴着“学问、道德、国粹”的画皮,他们是充满市侩气的文化圈,是油滑的所谓都市“上流社会”。他们一律张着学者、公理等等大旗,板起君子、导师的面孔,外表十分冠冕堂皇。不但如此,他们还对战士谦恭有礼,“一式点头”,具有典型的现代市民的伪善特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正人君子”,他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还有“证据”,妄图用胸前放着护心镜来证明他们的心在胸膛的中央。这个用服饰来伪装自己的冠冕堂皇的形象,极像张爱玲在1940年代描写过的“装在套子里的人”,通过服饰、化妆把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掩盖起来,而这些人在现代社会极具普遍性,他们代表了“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正是鱼龙混杂、功利主义、充满伪善的市民上流社会的集中体现。

在1940年代上海市民小说家予且的《如意珠》等市民小说里,描写过很多具有虚荣心、只重外表不重内心、对富人下跪、对穷人蔑视的小市民习性。鲁迅《狗的驳诘》、《立论》写于1920年代,对现代市民社会世态人心的揭露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普通人的眼里,狗总是根据人们穿的好坏,来辨别人的地位,然后决定它的吠与不吠。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大都习惯地说,狗是最势利眼的。鲁迅运用这个习惯思维,反将过来,进行翻新,揭示市民社会中的“势利眼”病,鲁迅讥讽地认为,这种人见着富人就摇尾,见着穷人就狂吠。他们在这一点上,真的是“愧不如狗”,对流行于城市社会中的市侩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立论》中同样,“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现实的市民社会就是在自欺欺人中维持虚假的繁荣,人人都有圆滑的生存智慧,却忽视了内心的真实。这种市侩主义的人生哲学在的初步城市化的 1920 年代社会中,像毒菌一样,支配着也侵蚀着人们的思想。鲁迅在自身生活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他以梦境的形式,将之熔铸在散文诗中,在城市表现中坚持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评”的立场。

三、现代城市的物质理性

早在 20 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对西方物质至上的文化偏至,做出了深刻的总结:“诸凡事物,无不质化,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①商业化导致的小市民习气,城市进程中的金钱至上,物质时代的道德沦丧,都成为《野草》中批判讽刺的对象。

《我的失恋》是一篇非常典型的都市书写,无厘头的“戏仿”写法颇似当下的后现代写作,而其主题又直指城市婚姻爱情中的实利主义与物质至上。“我”的失恋使之颓唐,绝望,可最后才发现,这重重的天然屏障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在豪家”,是养尊处优的权贵小姐,而我没有汽车,只是个贫苦没有地位的青年,那山腰、闹市、河滨正是这些富豪家小姐的居所,双方地位悬殊,障碍也必然出现。而当“我”的所爱面对“我”赠与的心爱之物,当然也是不屑的,因为无论“我”的“爱”怎样的诚心实意,在“她”眼里那只是丑陋、不祥、可怕的贱物,全然不如“我”这般珍惜。而“她”的“白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又是那样的富丽堂皇,相形之下“我”的就更加龌龊了,这一切也就注定了“我的失恋”。这层层的一步步升级的失恋后,“我”是近乎于崩溃了,鲁迅貌似豁达地指出——“由她去罢”,但事实上,我们在《伤逝》、《上海的少女》、《关于女人》等作品中,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现代城市物质性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鲁迅笔下,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在现代都市已经绝迹,婚姻爱情往往与商品经济、消费主义相联系,从而造成了情感的物化与爱情的商品化。

在商业化的都市环境中,实用主义与金钱至上的观念成为最显著的都市病。《死后》就对现代出版业的商业运作与铜臭气息做出了不留情面的嘲讽。文中的死者已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作为物质的身体已经死亡,但是作为精神的知觉还在,这种超现实的处理方法使得“死者”可以一窥商业社会真相。他已经连蚂蚁、苍蝇的骚扰都毫无办法,而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非要送他“明版《公羊传》,嘉靖黑口本”。书店老板就算人已经死了,他关注的不是对一个“死者”的人道主义同情,而是如何把其转化成商业对象和消费动力。鲁迅在 55 年的生命历程中,创办过未名社、朝花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等八个出版社,编辑出版过 20 种报刊,87 种图书,可以说是现代出版的践行者,对出版运作中的商业因素可谓了然于心,在这红尘万丈中,鲁迅借用死者的知觉神经,讽刺商业社会的文化也沾染了铜臭味,就算是人死也不放过,要榨干人身上的所有利用价值,发掘出全部商业属性。在《娜拉走后怎样》的公开演讲中,他说明在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经济地位之前,女性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从谈起的;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他进一步指出了女性以身体作为金钱交换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演出现代市民社会的道德难题。“只有在人格等同于富有和购买力的社会语境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3 页。

中,缺乏金钱才会对人格造成如此之大的威胁。”^①对于没有经济权的女性而言,除了自己的身份,她们没有其他谋生手段,鲁迅在散文诗描写一个瘦弱渺小的妇人因为饥饿,在做着每一个有羞耻心的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以此换来生存的资本。这种赤裸裸的交易是都市社会里常见的悲剧,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她为了女儿出卖自己的肉体与尊严,但长大后的女儿女婿外孙却无一人感念她的付出,反而以此为耻。现代社会的人情淡漠、利己主义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传统道德中舍己为人、知恩图报等一切美好的品德,在冷漠的城市现实中溃不成军,无处遁形。

四、西方表现手法下的都市现代性

《野草》中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作品,如《过客》、《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死火》等,它们的时间背景和人物生活处所的描写并没有十分明确和可靠的现实根据和现实指涉,很难看出其写作背景与意义指涉是都市还是乡村。但如果我们对这些作品的主题哲思、写作技巧与精神滋养仔细辨认,就会发现这些抽象的作品背后有一个城市的背影,也正是城市文明的影响,鲁迅才能写出这种和传统散文截然不同的,具有极其强烈的现代性与异质性的作品。

“鲁迅在对人的现实性即生命存在进行物质/生存层面的审视的同时,也进行了情感等内在的生命意象的考察。”^②《野草》的这种情感体验与现代城市带给市民的孤独、怀疑、探索种种现代性体验息息相关。当时鲁迅受到西方现代派创作的影响,文本中多次出现无边的“旷野”和“荒原”,看似并非城市意象,但其精神内核却是现代的、都市的。《雪》中写道:“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的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再次出现了“旷野”的意象:“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在传统的乡土写作中,旷野和荒原其实并非一个常见的意象,反而在都市逼仄的精神世界与被挤压的心灵场域中,它们成为缓解压力的最佳意象。在《过客》中我们几乎无法判决“多么荒诞无意义、即使走向的仍是死亡、生命总得走去”^③的过客的的确切的未来目标和未来世界是什么,所谓“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正是鲁迅对乡土世界里关于努力追求与最终获得圆满结果这一和谐局面的一个质疑。如《影的告别》中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质疑传统的未来与光明、爱与同情、追求与结果等看似神圣的事物价值。他打破了古典的秩序和传统的圆满观,体现出现代人生命体验中常有的悲剧感。鲁迅对未来光明持有深刻的质疑,这和“神本位”的传统农业文明影响下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而他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最终质疑,也是我们在传统农耕社会很少见到的,这种价值观直指现代都市。

《野草》的表现手法是非中国的,非传统的,具有强烈的西方现代性。《野草》写作受到波特莱尔等人的影响。众所周知,波特莱尔的文学成就与城市密不可分,本雅明正是从波特莱尔在巴黎的游荡与创作中得到启发,把他称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在“忧郁与理想”中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在“巴黎即景”部分写了一幅赤裸裸的工业社会大都市的写真画。鲁迅也非常类似,一方面关注自己的心灵磨难和精神搏斗,一方面又关注城市的外部物质世界。在《野草》中,死火发言,鬼魂叫喊、影的告别,狗的驳

^①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0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0页。

^②王学谦:《存在的焦虑与危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③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17页。

洁,死尸起坐等恐怖怪诞的景象,形成了人造的天堂和现实的地狱,这个盛开着鲜花又充满着罪恶的地方正是波特莱尔的巴黎和鲁迅的北京。同时,《野草》与加缪、萨特《禁闭》、索尔贝娄《挂起来的人》在存在主义思考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如《过客》就非常类似《等待戈多》。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城市的发展,虽然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萨特《禁闭》、瑞典作家斯特林堡《鬼魂奏鸣曲》、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秃头歌女》等的人物塑造一样,《野草》也注重揭示现代人共有的隔膜与孤独主题,这一主题在《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中体现得最为强烈,鲁迅借此思考西方哲学家也同样关切的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价值、生存环境、内心分裂等抽象而深邃的问题。“《野草》将鲁迅在‘五四’时期苦闷激荡的心理真实,含蓄而形象地化为外在表现形式,在悖论、反讽中,作品形成纠缠冲突而非整合、流动不居而非静态的文学张力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中,鲁迅富有独创性地通过‘悖反’营造出一种新的时代美感,它超乎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而生成,让读者在真切的阅读体验中获得灵魂的淬炼与美的享受。”^①正像波特莱尔一样,城市文明、社会风气、商业图景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但他们并非客观、机械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幻化,把他们折射出来,而这种词语悖反和隐喻象征表现方式本身,就具有城市文化的特点。

“现代人在社会、知识和艺术上的困境,有种种历史条件的多重决定,但现代人又渴望超越困境,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就在这一语境下展开”^②。《野草》的部分篇章是都市境遇的直接描写,还有部分篇章是鲁迅在这种都市经验与人的物化的困惑中展开的存在之思。《野草》写作期间,他身处都市,一方面写出了市民社会的世态人心、物质境遇下的都市疾患,另一方面也以抽象化的情感、存在主义的思考立场昭示着背后城市文化的影响与推动。一般研究者认为鲁迅与城市的关系到了1930年代的上海生涯才出现胶着状态,但通过对《野草》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对城市生活有了深刻而持久的关注,并借鉴西方城市文学的表现方式,将这种现代人的困惑与思考展示出来。

(责任编辑:陆 林)

Revisiting Lu Xun's *Yec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Life

ZHANG Juan

Abstract: Lu Xun's *Yecao* 野草 (literally Weeds) constitutes a rich mine of information about its author.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offered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ose collec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few of them observed this masterpie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author's experience of the urban life in Beijing, which is actually closely related to his motivation for producing this collection. From some pieces in the collection, we can see Lu Xun's reflection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urban life from the angle of a Benjamin's flaneur, his revelation of the uneas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his criticism of the worship of materialistic pursuits. From other pieces that focus on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we can see his modern and western-styled account of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Key words: cities; Lu Xun's *Yecao*; reinterpretation

^①杨剑龙、陈卫炉:《论鲁迅〈野草〉的词语悖反、母题悖论及其艺术张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②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